

農民自由黨的興衰

王覺源

中國黨派滄桑錄之十五

四川省糧民索債團

中國對日抗戰勝利後，政府為和平解決國共兩黨糾紛，積極開始實行憲政，建設國家。因而聚集各黨各派人士及社會賢達，舉行政治協商會議，共謀國是。一般政治野心人物，均企圖插足政治舞台，爭得一席之地。於是各聚其衆，五人一黨，三人一派，一時大小黨派，風起雲湧，開中國歷史空前未有的現象。

中國農民自由黨之出現，就是在此種時勢之下造成的。其出現之另一機會或原因，則為被四川「糧民索債團」之活動與其所獲成果的引誘鼓勵，因利乘便所促成。於是該黨的負責人如何魯、王白與、王國源等，皆為索債團主要份子。組黨亦即在該索債團解體之後，時為民國三十五年八月間。

所謂「四川糧民索債團」事件，是起因於抗戰勝利、建國開始之際。四川省參議會，為把握機會，爭取時間，積極推動川省地方建設。於是決議：「動用中央應還川民各年度借谷，作為川省建設基金」。此項決議，乃藉地方之財力，作

地方建設之用，從原則上講，是絕無可以非議的地方。不幸的，此舉竟被少數反對川局現狀者所利用，加以曲解，鼓動風潮，欲藉此擴大為其政爭的工具。因而號召各縣糧民，羣起反抗。組織所謂：「糧民索債團」從事推動。其主持人，團長為胡文瀾（後退出），副團長為何魯、王白與等。展開活動，形成軒然大波。

幕後傳說人事淵源

川省議會「動用借谷案」，既被糧民索債團所利用，扯入政治漩渦。四川省參議會深恐善政反成惡果，乃於三十五年七月開會，將原案撤銷，並決議：「中央借谷，仍應歸還糧民。」至此，糧民索債團的目標，既完全消失，風潮平息，該組織亦歸解體。事後傳聞，糧民索債團事件之發生，前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當時担任陪都衛戍總司令的王懋緒，實為該團之幕後主持人。其如此持論者，或因索債團的主要人物如胡文瀾、何魯、王白與等，均與王總司令有較深關係之故。或謂王氏此時亦欲藉此索債運動，達其重主川政之目的。此不論其為道聽塗說，或為有意誣枉之

言；總之，無風也不會興浪的。

糧民索債團，可資利用的目標既已消失，但該團之組織與人事，尤其是農民羣衆，仍有利用作政爭的價值。故該團之主要份子何魯、王白與、王國源等，也不欲輕易放過機會。便順水推舟，對該團既有的組織關係與人事聯繫，略加調配，遂使糧民索債團蛻化而為「中國農民自由黨」。

索債團於七月間停止活動。中國農民自由黨便成立於三十五年八月。曾發表「宣言」及「政綱十九條」。且製發「各級黨部須知」與「各級黨部組織系統表」等文件。人事方面，則推定何魯為主席；王國源為祕書長；王白與為宣傳部長；李俊英為組織部長。並決定；中國農民自由黨總部，設於重慶。辦事處分設：唐家沱載英中學，時何魯担任該校校長；化龍橋王國源住宅；及重慶大學內三處。

中國農民自由黨成立之始，何魯等即計劃為黨建立經濟基礎。首在重慶組織「農本公司」。以經營鹽業為主。因鹽業經營較易而獲利較厚。資本的籌集，擬以原四川糧民索債團份子為徵股對象（謂其能收回借谷）。總額定為千億元。並

擬於上海、成都、重慶三地，成立分公司。上海分公司，派曾任四十一軍孫德操部之高級參謀雷畏蓮負責。成都分公司，派曾與劉文輝有關係及曾任王鑽緒顧問的王雲凱負責。重慶分公司，則派張懷奇負責。以後發展如何？則不悉其詳。不過該黨份子，多數都是四川糧紳，或與糧紳有關之人。糧紳多是富有的。所以該黨在經費方面，似非很大的問題。

該黨自稱其黨員，當時約有七十萬人。則未免過於誇張。黨員之所以有如此龐大數量，則謂為糧民索債團的份子，均已加入該黨。實則索債團的份子，皆為各方臨時湊合而來。嗣聞借谷案已得合理解決，則皆分道星散，其組合自然無形瓦解。該黨零星星吸收了一小部份，容或有之。若謂全數加入，則為欺世惑俗。據估計，當時該黨黨員，決不會超出七百人的範圍。

何魯二王歷史背景

中國農民自由黨，幾個首要負責人的歷史背景，雖不算特別突出的人物，亦非一般平庸等閒之輩。個別分析起來，似皆應列入優秀之林。如何魯，係四川廣安人。早年留學法國，攻習數理，乃其專長。返國後歷任南北各大學教授，及安徽大學校長，頗負時望。抗日戰爭發生，西遷來川，曾任重慶大學院長及教授等職。並在重慶唐家沱，創立一所「載英中學」，自兼校長。其人天性孤傲，懷才自負。所習為數理之學，又喜愛詩詞歌賦及書法，書法且略具格派。豪於飲，又常藉酒罵座，批評時政，似為一極不滿現實之人。

。遇有上課或講演，輒慷慨激昂，事後詢之，亦常不自知其所云為何。甚至酒酣耳熱之餘，不惜與其學生晚輩，出入花街柳巷，同作狎邪遊。常不修邊幅，放浪形骸，謂為一名士型的人物，未嘗不可。但如寄以一黨領袖之重任，期其善盡領導之責，則恐難負眾望。

王國源，四川西充人。留日本帝國大學，前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鑽緒之侄。隨王工作甚久。王任川省主席時，王國源則任省府駐渝辦事處處長。迨王鑽緒轉任陪都衛戍總司令時，王國源亦隨之任秘書。「王氏重主川政運動」發生時，王國源乃為其主持人。第四屆國民參政會，王國源則由四川省參議會，轉為國民參政員。農民自由黨之成立，王國源出資出力亦最多，實為該黨負責實際責任的人物。何魯雖負主席之名，實不過王國源之傀儡而已。

王白與，四川蓬安人。早年就讀於北平。為蒲伯英氏之女婿。伯英氏名殿俊，四川廣安人，前清進士，辛亥革命時，川省之領導者，曾任四川諮議局局長，（一八七七——一九三五）。王白與返川後，曾在劉湘部下工作，服務於新蜀報。劉湘主川政時，王亦隨同至省府工作，並主辦華西日報。俗語說：前人種樹，後人乘涼。王藉蒲伯英的蔭蔽關係，得與川中舊日軍政要人，多所往來，聲勢亦因之而壯。三十五年八月，重返新蜀報，任總經理。王時以「農民自由黨宣傳部長」之資格，有將新蜀報收為該黨黨報之擬議。惟因該報內部，人事複雜，雖討論很久，終未成爲事實。

此外尚有李俊英者，東北人。時年約三十餘歲。據說：蔣主席（介石）兼長中央大學時，李曾任警衛隊長。他長於國術及魔術，在沙坪壩設立一所「圖強國術社」，自兼社長。廣收徒眾。據云：有徒眾百餘人，多為無業之遊民。該黨主席何魯，以其勢力可以利用，因拉之入黨，畀以組織部長。並介紹他在重慶大學總務處服務。何常語人云：「小人物，大用場」，蓋即指此李而言。

絃外之音爭取國代

中國農民自由黨，曾一再公開宣稱：「決不參加政權之爭奪」。實則該黨首要份子的政治興趣，均極濃厚。對於國大代表的追求，尤為殷切。凡此皆可於其言論態度中，窺見其內心深處。三十五年八月，當該黨成立之初，對外印發很多傳單，「主張速開國民大會，不再延期。擴大代表名額，儘量容納政協會以外之賢人君子，共決國是」。另一文件則曰：「在此種情況之下，莫若速開國民大會。既定會期，絕不可再行延展。集合全國優秀份子於一堂，完成一部嚴肅而美備共同遵守之憲法。……惟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以前，所產生之國大代表，吾人雖不敢完全否認；但其時各地方政治，尚為封疆大吏所把持，或為一黨一派所壟斷。……不免稍有遺憾」。至於「三十五年政治協商會議，以二三黨派之集議，竟決定一切國家大事而毫無慚色。最後將國大代表名額，增加為七百名，而自行佔去百分之九十三」。

因此農民自由黨，認為「補救之法，最上者莫如徹底改選。次則於七百名之外，再增加一千名。凡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之黨派與賢達，不在此數。須大量容納工、農、商、學之優秀人物，及在野廉潔樸學熟思之君子，以期盡善盡美」。諸如上述之言論主張，可見該黨當時對於國民大會，尚採擁護的態度。絃外之音，則不過希望於國民大會代表名額中，分得若干席位。證以大會後，該黨之言論行動，實非誣詞。

初持政見尚屬得體

該黨於爭取國大代表之活動外。關於政見主張，曾有「中國農民自由黨最近十四條主張」發表。原文冗長，類皆人云亦云之詞，無有特殊。即於每條主張之後，均加說明。並強調世界第三次大戰，已難避免，為民族生存、人類和平計，唯有切實執行其十四條主張，才有辦法。

該黨提出十四條政見主張後，主席何魯，為謀擴張黨勢，並取得中外各方的贊同與影響計，曾上書政府當局。分函我國留外學生及外國友人。並開會函羅斯福（美前總統）夫人；美國杜魯門總統；英國邱吉爾首相；法國皮杜爾總統；俄國史達林元帥等。一方面闡揚該黨的政見主張及解決我國目前國事政策，一方面則希望各國予以同情及支持。

政治協商會議後，政府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。由於中共之毫無誠意，玩弄陰謀手段，以致拖延多時，毫無結果。該黨曾致書各黨各派，進行勸告。略謂：「當今世界各國，聰明才智之士，

方努力於全人類幸福與和平之建設，而我國則正展開大規模之內戰，言之可恥」。吾人對於政府，自當促其走上民主與修明政治之途徑；但亦不宜盡削喪其威信，使之毫無能力。至於破壞其有利人民之設施，以洩一黨之憤怒，尤為過分。黨派武力，已成過去。無武裝之黨派，更不容依賴有武裝之黨派。不可以黨助長內亂，從中取利。應秉公協調，維持正義，使中國統一，而成爲世界健全之民主國家」。此函曾刊載於重慶新蜀報。該黨此時，對政府正存着甚大的希望（國大代表）！故所有政見主張，都尚屬溫和得體。與當時一般黨派，與政府背道而馳者，自有不同。

所求不遂反對國大

農民自由黨幾個主要人物，對於國大代表深有興趣。及國民大會開會前夕，猶多方展開活動，冀能如願以償，參加開會！直至政府將社會賢達全部代表的名單公佈後，該黨首要，竟無一人獲選。若輩失望之餘，便不免老羞成怒。乃於制憲國民大會開幕後之第四日（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），一反過去態度，通電反對國大召開。認爲「團結既不可能，召開國大毫無意義。不如即行停開，免空耗國帑，而造成不可挽救之重大糾紛。如其勢成騎虎，爲顧全政府威信，則請取消國民大會名義，改稱憲法起草委員會，以息紛爭，而固國本。」

該黨由擁護國大，一變而反對國大。一則曰「停開國大」；再則曰「取消名義」。如此出爾反爾的言論態度，實與中共、民主同盟和其他附

庸中共黨派之反對國大，頗有異曲同工，漸趨合流之勢。該黨原係尚可與爲善的黨派，後竟不惜出此下策，亦足見其黔驢之技已窮。

與反政府黨派勾結

農民自由黨，在思想主張上，原與中國共產黨是絕不相容的。但以爭取國大代表未遂，即大有不滿政府的態度。在中共「反政府」的統戰策略與利用各小黨派之原則下，對此新起的反政府的農民自由黨，亦自不免有乘機捕獲利用的企圖。

適有林立飛者，福州人，年約四十餘歲。原爲中共南方支部負責人之一。真實姓名不詳，林立飛爲其化名。他與農民自由黨之要角王國源，原係日本帝大同學。當農民自由黨不滿於政府時，林即掩蔽共黨身份，乘虛蹈隙與王國源拉近關係。王未深察，即介紹其加入該黨。林入黨後，即發生滲透僞竊作用。該黨所有發展活動計劃，甚至機密大事，林均參與商討。不僅此也，林於取得王國源等之信賴後，並以該黨名義作掩護，在京、滬一帶，展開活動。陰爲中共與民主同盟發展勢力。進而不僅與各地所謂民主人士，有了密切往來，即與中共亦有了秘密勾結。該黨首要份子，雖已有所覺，然亦甘之如飴。其用意亦不外欲與反政府各黨派密切聯繫，藉狼狽爲奸，以增加其自家黨派之聲勢。

該黨雖以「農民自由」爲號召；但對解決土地問題的主張，爲「私有制」。照共產黨的術語和階級分類來說，該黨實爲一代表地主階級利益

的集團。這一主張，尤與中共當時的「分田」、「沒收」等土地政策，矛盾已極。該黨因對政府不滿，曾於三十六年春間，受共產黨的利用，在四川各地，發動所謂抗捐、抗糧、拒服兵役運動。惟因力量薄弱；鄉民亦多瞭解該黨與中共的祕密關係，不願盲從；以致未獲效果。

雖欲回頭終告消沉

農民自由黨，向政府方面，找不到政治出路。勾結中共所作的盲目行動，亦無所獲。即決定改變該黨的發展方向，開闢新的政治路線。因於三十六年三月間，在重慶召開所謂該黨一中全會

。到會者為主席何魯、祕書長王國源、宣傳部長王白與、組織部長李俊英、中委張聖與、殷調元等七十餘人。

會議商討新的政治路線及一切策略計劃。會決定策略四點：一、竭力開展社運，拉攏袍哥，加強羣衆力量。二、盡量吸收農科學生及農業界人士，爭取各市縣鄉農會人員，予以運用。三、各小黨派之聯絡，並設法與民、青兩黨中下級幹部搗手。四、加強宣傳工作，調整新蜀報人事，使成爲純粹宣傳機關。

同時，對其下級黨部，亦作了四項指示：一、組織之發展，不能只急於求數量，而應力求質

之健全。二、各級黨部，應爭取外圍組織，各種社團，推動黨團核心作用。三、對政府及在野黨派，應力避無謂之誤會。對外聯絡，應以謙而不卑的態度。四、各級黨部經費，以自籌爲原則，必要時，由中央酌量補助。

從該黨所決定之政治新路線策略與對下級黨部之指示觀之。頗有在暴風雨之後，祈求寧靜；亦似已覺今是昨非，趨善向上之意。祇因中國政局環境大變；各黨派被中共所利用之價值，愈來愈小。農民自由黨，雖欲回頭，已時不我予了。故其所謂政治新路線、策略、計劃，亦都成了空勞畫餅。

成

語

追

蹤

(六)

何 宇 白

犬部——狼

「狼」獸名，形似犬，長約五、六尺，能涉水，棲山林中，晝伏夜出，性貪殘，食兔、鹿、羊、猪及鳥類。其中一種，係前二足長，後二足短，常駕狼（一種前二足短，後二足長的狼類）而行，無狼則不能立行。故有狼狼之稱。姓氏中有以狼爲姓者。

以狼字起始之成語如後：

「狼子野心」，以狼子心在山野而難馴，養起來只有害人。

喻兇暴的人，其性難制，其心莫測，不易馴服的，語出「左傳」。它提到：魯宣公四年的時候，楚國的司馬子良生了一個相貌難

看的兒子叫越椒，另一位名子文的楚臣會看相，認爲此子長來像熊虎，聲音猶如豺狼，勸子良將他殺掉，以免後來危害國族。他強調：

「豈有狼子野心之說。這孩子便是狼，怎麼可以養育呢？」

「狼心狗肺」，喻如狼之貪欲，毫無良心，狼心語出「後漢書、南匈奴傳。」

「狼吞虎嚥」，形容進食時又猛又急，態度欠雅觀。

「狼狽爲奸」，喻險惡之輩，相倚爲惡。有如

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，狼前二足短，後二足長，故狼無狼不立，狼無狼不行，須互濟其長，始可以作惡。

語出「博物典彙」。不過如僅用「狼狼」二字，其意義便係二獸相附而行，離則顛仆，引申爲顛倒失措，悽悽惶惶。如：「苟悅著漢紀」——周勃狼狼失據，塊然囚執。

又「李密、陳情表」——臣之進退，實爲狼狽。

「狼眼鼠眉」，形容人之相貌兇惡。

「狼貪虎視」，喻野心狂大，語出「長生殿」。

「狼藉聲名」，亦稱「聲名狼藉」，喻惡聲散布。語出「史記、蒙恬傳」。又狼藉之藉，與籍通。除了如上解釋之外，雜亂不整也叫狼藉，如「史記、滑稽傳」屢屢交錯，杯盤狼藉。

狼藉。